

人民日报

近代中国人物自述系列

柏文蔚 字烈武，安徽寿县人。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者，同盟会早期成员。民国成立后出任安徽总督，“二次革命”时期宣布安徽独立，起兵讨袁。与李烈钧、胡汉民、谭延闿并称为“讨袁四督”。

柏文蔚

1876—
1947

自述

柏文蔚◎著 文明国◎编



天紀年兄之

萬里秋風嘶甲馬

千山斜日度旌旗

癸酉孟夏柏文蔚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柏文蔚自述

柏文蔚◎著 文明国◎编



1846—
1947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柏文蔚自述 / 柏文蔚著 ; 文明国编 . — 北京 :
人民日报出版社, 2011.7

(人民日报·近代中国人物自述系列)

ISBN 978-7-5115-0503-3

I. ①柏… II. ①柏… ②文… III. ①柏文蔚
(1876~1947) — 自传 IV. ①K8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25738 号

书 名: 柏文蔚自述

作 者: 柏文蔚

出 版 人: 董 伟

责任编辑: 银 河 陈志明

封面设计: 陈淑平 梁 宇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2号

邮政编码: 100733

发行热线: (010)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

邮购热线: (010) 65369530

编辑热线: (010) 65369533

网 址: www.peopledaily.com.cn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1/16

字 数: 200千字

印 张: 18.75

印 次: 2011年7月 第1版 2011年7月 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5-0503-3

定 价: 38.00元

缅怀先父柏烈武将军

代序一

柏心瀚

先父已去世三十九年了。他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作了坚持不懈的奋斗。早年他追随孙中山从事推翻清王朝腐败统治的革命活动，为辛亥革命的元勋。二次革命时，他是著名的讨袁四督^①之一，以后他一直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反共政策，是国民党中反蒋的重要人物。他同情中国共产党，并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。他一生为革命四处奔走，戎马倥偬，不问家计，清廉自守。他稟性耿直，嫉恶如仇，从不向袁世凯、蒋介石等权贵们低头。他拒不接受袁世凯的重金收买，也不屈服于蒋介石的谋杀威胁。他的品德操守，也是值得我们子女永远铭记的。

我是他最小的儿子，我出生时他已四十九岁，因此对他的前半生，我只得知于家人和亲友，有时也听他自己说过一些。

^① 一九一三年三月袁世凯向外大量借款，用以扩充军备，打击革命势力。江西都督李烈钧、安徽都督柏文蔚、广东都督胡汉民、湖南都督谭延闿通电反对，世称“讨袁四督”。

抗日战争期间，我家避居湘西，常随侍先父左右，情况了解稍多一些。现仅就记忆所及，将印象比较深刻的事迹，加以记述，借以缅怀。

一、朴实无华，清廉自守

先父从事革命，其前半生革命工作繁忙，对于家庭生计，子女教育，几乎无暇过问。毕生对钱财产业视如粪土，毫不贪恋，清廉自守，安贫若素。

先父在二次革命中，由安徽退往南京接任江苏都督时，接管了造币厂。先父即下令封存，全部作为军用。当时我们全家随同到宁，先父因工作繁忙，很少回家看视。家庭经济拮据，一大家人开不出伙。我祖母主持家计，很为焦急。有人向她说，我父亲接管了造币厂，钱多得很。我祖母不明究竟，找我父亲来大发脾气。先父无奈，只好写借条借来二百元，应付家用。

约在一九二八年左右，我家搬到南京，买了祠堂巷一所房屋居住。隔壁即是国民政府财政部。后来孔祥熙托人来说，财政部扩建需要这块地方；并说，随便你要什么地方，盖什么样的房子，全由财政部负责。我父亲说：“既然政府需要，将这所房子奉送，我再搬到其他地方住，不劳政府费心。”当时正好先父的好友江彤侯（晔）举家北迁，把他在玄武湖的一块地皮和几间平房送给我父亲，我家即搬到这里住。第二年，先父送给他五百元钱，抵作房价。这里原来只有几间平房，家里人多，住不下，便添建了两间，此居先父自称“柏园”，周围竹篱，门外有二尺多宽的小路。他在南京的几年，当时任国民党中央

执行委员及国府委员，就是在这里度过的。

抗日战争时，举家迁居湘西永绥（今花垣县），随行的家人、亲友和旧部都靠他薪金维持生计。那时，他作为国府委员每月薪金八百元，后来由于物价腾涨，法币贬值，生活愈来愈困难，每到月中以后，即盼下月薪金寄来，待一寄到，即全部分完。最初的分配方法是按人口平均，不论家人、亲友、旧部，一视同仁，同样对待。以后有的亲故便自谋生计，但他对生活困难者仍予以补助。那时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，只有张治中先生还念及先父曾经是他的老师，有时寄点钱来。记得有一次，陈诚（第六战区司令长官）路过永绥，前来造访，看我家实在困难，就命人送来三包平价米。当时我父亲认为，如果退回去陈诚会以为嫌少，于是就收下了（他是从来不轻易接受别人馈赠的）。有一时期，他还带头和家人一起吃玉米饭。虽然如此，他从不以为苦，而且时常教育勉励我们：“前方战士很艰苦，在后方吃点苦是应该的嘛！”

抗战胜利复员回南京，玄武湖的那几间房子被日本飞机炸毁了，没有地方住，就借住在我表哥王坦甫家中，只有我随侍在他身边。我一面在中央大学读书，一面照顾他。另有一个十几岁的小鬼，帮助做些杂事，早晚有时搀扶他去玄武湖散散步。如要去较远的地方，则要事先向亲友商借车子。

他时常谆谆教育部下“干革命不能爱钱财”。曾和老部下相约，不为子女置产。他死后的遗物，唯有一些打了补丁的随身衣服和平时写字用的几支毛笔、两块砚台和几锭黑墨而已。每当我们见到这些，便不由得潸然泪下。但也为他有如此傲骨，不屈不挠，清廉自守而自豪，更增加了我们对他的敬仰。

二、稟性耿介，一身傲骨

先父稟性耿介，嫉恶如仇，对图谋私利、危害革命或阿谀奉迎、钻营拍马之辈，极为痛恨，甚或当面责斥，直言不讳。因此殊为某些人所不容。

一九二七年，蒋介石叛变革命，制造“四一二”反革命事件，大搞白色恐怖。当时蒋掌握重兵，大权在握，正是盛极一时、炙手可热的时候。先父当时任三十三军军长，驻扎合肥，曾领衔以三十三军将领的名义电请蒋下野^①。这种不畏强暴，反对独裁，为革命伸张正义的大无畏精神，在当时是令人震惊的。

一九三二年左右，先父在南京参加中央某次会议，陈果夫、陈立夫兄弟见他到来，立即上前招呼，并伸出手来，欲与握手。先父最不耻此二人结党营私，争权夺利，于是把手一甩，昂首直入，不予理睬。弄得他俩很为尴尬。

我家住玄武湖时，一次，蒋介石驱车前来专访，家人报告后，先父对家人说：“就说是我说的，我家地方小，无法招待。”

① 据原三十三军第一师参谋长张景周、原三十三军第一师副师长程华亭回忆录记载，电文是：“万急。上海探呈总司令蒋。密。国共分裂，举国惊疑，北伐前途，关系尤巨。现在我军悉数南调，敌人乘隙重来。我公因急于南顾私忧，遂疏于北伐大计，仅以文蔚等所率疲惫不堪之孤军，当此孙、张联合数十万之劲敌，在我公固不惜一掷，但恐贻误所及，守淮不成，江亦难保，祸由自召，咎将谁归！文蔚等效命前驱，一秉正义，心所谓危，言遂逆耳，我公远瞩高瞻，定能见微知著。务请上念总理三大政策，下徇民众一致要求，勒马悬崖，早日下野，则天下尚可共谅，两党合作复成，从此壁垒一新，目标一致，革命能彻底胜利，我公亦与有荣施，用敢迫切陈词，毋任惶悚待命。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，党代表常恒芳，师长袁家声、张克瑶、岳相如，副师长程华亭，军参谋长王铸人，师参谋长俞维樵、张景周、白坚，旅长廖梓英、张韬、张承治、徐直楷、刘显亭、张××暨全体团营连长等同叩。印。

如此挡驾谢绝了。以后，蒋介石又托人来征求先父的意见：“你家房子太小，愿意在哪里，就在哪里给你安排房子。”我父亲说：“我住得很好，不想搬家。”就又谢绝了。

三、不计个人成败，一心为革命

先父毕生以革命事业为重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成败。纵览其一生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，均是在革命紧要关头，为维持革命向前发展而勉力承担的。如辛亥革命时，武昌刚举义旗，上海同盟会总部数次电召，他由东北回到上海和陈英士（其美）、黄克强（兴）会商决定，先父负责南京光复。攻下南京后，他印发表通电，欢迎黄克强回南京就任大元帅。南京光复后，三军各自称雄，无人统帅，此时他受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并统一指挥江、浙、粤各军挥师北伐，攻克徐州。待南北达成和议，黄克强撤销南京留守府，南方军事失去重心，为保存一部分革命实力，他在安徽极为混乱之时，就任安徽省都督。二次革命濒临失败前夕，他到达南京，毅然承担了江苏省都督的职务，为革命勉力支撑残局。一九一八年，他受孙中山先生之命，到川、鄂、湘边策应地方军队参加护法战争，担任了川、鄂联军前敌总指挥。一九二一年，孙中山赴韶关，准备誓师北伐，特任命他为长江上游招讨使，策应地方军队接应北伐军。一九二六年，为了保存安徽省革命力量，迎接北伐革命高潮，他收编原淮上军旧部及安徽革命武装，担任了三十三军军长。凡此种种，皆是为革命的需要而承担的极为困难的工作，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。先父受命于危难之际，从来不为个人成败

得失打算，反之，他认为不利于革命的，虽是要职，亦坚辞不就。如二次革命后，他亡命日本，孙中山在东京筹组中华革命党，要他担任中华革命党军务部长。他开始答应了，待回到长崎寓中，慎重考虑后，为了增进孙（中山）、黄（克强）团结，避免革命阵营发生分裂，写信给孙中山，主动辞去军务部长职务，并建议由黄克强担任。

民国元年，先父任安徽都督时，曾严令禁吸鸦片，通电封闭烟馆，各县成立“戒烟会”，劝民戒烟。安徽戒烟在全国各省最早、成绩又最为显著。当时有不法英商勾结安庆奸商私运大批鸦片，在安庆码头被警务人员查获。先父毅然下令，命警察厅长祁耿寰将英商烟土全部查封。次日，英国领事向安徽省都督府提出无理抗议，同时又将英国炮舰卸去炮衣，将炮口对准南门城楼，声言二十四小时内不交出鸦片要炮轰安庆。先父毫不示弱，一面将炮兵陈列江边，与之对峙；一面不顾个人安危，亲自登上英舰与之交涉，义正词严，英人莫奈他何。恰巧这时孙中山从芜湖乘“联鲸”号兵舰西上汉口，先父便乘炮艇东下迎接，把情况报告给孙中山先生，孙大加赞许，极力支持，并登岸当众发表演说。在中山先生的支持下，先父下令当场把全部鸦片点燃，一时火光冲天，一直烧到第二天清晨，群众无不拍手称快。英人无可奈何，只得把兵舰开离，从而取得了此次反帝斗争的胜利。事后有人吟诗，把此次烧烟的义举与林则徐虎门焚烟相比。诗曰：“百年相望正遥遥，一炬重将毒物烧。夹岸万人齐鼓掌，笑看敌舰已惊逃。”此事当时在全国震动极大，在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
四、思想跟随时代前进，主张国共合作

先父的思想随着时代前进而不断进步。他拥护孙中山先生的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，主张国共合作，是国民党的左派。但他的这些进步活动，多半在上层进行，不易为一般人所了解。

1. 协调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。先父早年从事反清革命斗争时，便结识了陈独秀，同他共同筹组岳王会。民国元年，先父任皖督时，委陈独秀为秘书长。凡安徽施政措施，诸如充实行政机构、整顿财政开支、兴办教育、解放妇女、破除迷信、实行禁烟等，陈莫不参与其事，襄助甚力。讨袁失败后，先父与陈独秀同避居日本。由于陈与先父在辛亥革命前后是患难至交，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实不同于一般。因此，先父受陈独秀思想的影响较大。陈独秀在上海介绍他认识了苏联代表越飞。一九二三年，先父偕陈独秀和越飞赴广州并介绍他们和孙中山见面，共同研究国共合作问题。随即受孙中山先生指派参加党务改组工作，在李大钊、廖仲恺、陈独秀、谭平山共同努力下，协助中山先生成立了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，聘请鲍罗廷为顾问，起草改组宣言及党纲草案，确定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。一九二四年一月，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正式形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。这次大会的军事报告是先父做的。他能在这次国共合作过程中起一定的作用，是和陈独秀的影响分不开的。

2. 掩护共产党员。北伐时，先父任三十三军军长，军中有

很多共产党员干部。蒋介石“四一二”叛变革命后，先父在白色恐怖下，掩护营救过许多共产党员。当时柯庆施即在三十三军驻沪办事处，用替三十三军办报的名义作掩护在上海进行地下活动，并屡次到我家向我父亲领取办报经费。北京农机学院党委书记王更生（已故）和李云鹤（原名郑鼎，后曾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，已故）均曾被捕，经先父营救出狱。

抗日军兴，先父在湘西避难八年，经常宣传国共合作的主张。一九四〇年春，国立八中高二部闹事，校长头被打伤了，学校领导诬为共产党破坏，学校停课。学生代表请他到校，他在师生大会上讲话，主旨是：现在国难当头，国共两党应该团结起来，共赴国难。他说：“国共两党好比两个兄弟。我就主张以黄河为界，黄河以北归共产党，黄河以南归国民党，看谁治理得好，老百姓就拥护谁。”他又说：“每个人都有他的信仰，是不能压制勉强的。我有个女儿在女高部读书，她要到延安去，我给她路费，支持她去延安。”

杨金龙和杨宗贞（女，共产党员）被捕关押在湘、鄂、川、黔剿匪指挥部里，都是经先父保释出来的。

先父不止一次公开说：“不管国民党还是共产党，抗日的就是好党。”这句话给大家的印象很深。在蒋管区里很难听到这样公正的声音，特别是出自国民党元老之口，这句话的分量就更重了。他的这些话，在当时确实澄清了很多人对共产党的误解，纠正了许多错误的看法。

我心慧大姐说，约在一九三九年，先父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中央会议，当时住在她家里。以后因客人多，便在郊区山洞租了房子。他每次开会回来，总是带来大批会议文件，有的上面

有“机密”、“绝密”字样，我姐夫闵刚侯（解放后曾任中央司法部副部长及民盟中央秘书长）征得父亲同意，把文件拿回家看，有的送给董老（必武）看，有的送给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同志们看。这是国民党的机密，先父明明知道，也不怕承担走漏机密的责任。

关于国共合作的主张，他经常在私人谈话中宣传，在大会上公开宣传，而且身体力行，并撰写成春联，贴在自己的大门上：

渴望国共合作，倭奴奸暴终必灭；

晋神威灵显化，土豪劣绅不容昌。

3. 支持我姐姐培思（心锦）到延安。抗日初期，我姐姐培思在湖南乾城国立八中女高部读书时，带头闹学潮，弄得C.C骨干分子八中校长邵华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）很头疼。有一次，邵华专门驱车到永绥我家来，带来一大捆马列主义进步书刊（是我四哥共产党员心一寄来，被邵华扣下的），邵华对我父亲说：“你女儿尽看这些共产党的书，你看怎么办？”我父亲回答说：“我一向主张他们各方面的书都看看，看三民主义的书，也看共产党的书。青年人要让他们开开眼界嘛！”弄得邵华很没趣，丢下书，灰溜溜地走了。当时我随侍先父在侧，现在还记得很清楚。

后来邵华要逮捕我姐姐，她被迫出走重庆。不久，先父去重庆开会。姐姐要去延安，父亲表示赞成，随即给了路费，作了安排，支持她到延安。我姐姐到延安见到了毛主席，毛主席还问我父亲的身体怎样，眼睛怎样？以后为我姐姐的婚事，董

老(必武)和林老(伯渠)联名来信征求我父亲的意见。二老的来信,我一直保存多年,视为珍品,不幸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丢失。

五、忧国忧民,怀念桑梓

先父晚年闭门自守,吃素念佛,自称“松柏居士”。除平素亲近的人有时来访外,与一般“达官贵人”均不往来,给人以“厌倦政治,超尘出世”的印象。其实他处在当时的独裁统治之下,目睹虎狼当道,政治腐败,民不聊生,前方节节败退,心情极其沉痛。再看自己已两手空空,连生命也无法保障,确实无可奈何,因而心情忧郁,精神极端痛苦,加之贫病交加,日形衰老,虽有救国救民之志,而已力不从心。所以他远离当时之政治中心——重庆,僻处湘西乡间,吃素念佛,宁静淡泊,静观时变,确有其不得已的苦衷。而从其平素言行及亲笔日记中看,他忧国忧民之情时有流露,爱国爱民之心始终未泯。我们当时年幼无知,对近代历史和他一生的经历缺乏了解,对其处境和心情都不够理解,故虽随侍在侧,也只能在生活上照料,并不能在思想上给予什么宽慰。现在回想起来,他每日静坐念佛,写写字,种种花,到乡间或公园散散步,生活看来十分平静,但思想上却并不是很平静的。到湘西后,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亲笔撰写《五十年大事记》,亦即他毕生革命经历,意在将辛亥革命以来的亲身经历翔实写出,使他人能够真正了解。这篇文章对各阶段革命史实功过均有所评述,甚至对蒋介石的独裁跋扈、排除异己、危害国家和革命,亦不稍假辞色,直言不

讳（他口头或以诗文骂蒋介石的时候很多，亦不管地点和场合），因此这篇稿子到解放后我们才敢拿出来发表。写完此稿后不久，他即大病一场，两年多才稍好。一九四五年八月，他又恢复写日记，封面题作《松柏居士日记》。但此时他已形衰身弱，出入皆须有人相伴扶持，与以前英武矫健、驰骋沙场已判若两人。他感到自己在这种身体和环境条件下，政治上已很难有所作为，因此寄希望于共产党，寄希望于青年一代，他日记中说：“青年学子系国家之至宝，秉天地之正气，将来使命甚巨大也。”他除了让自己子女参加共产党和去延安以外，还亲自营救保释了不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。他坚决反对旧国八中开除学生，他说：“国立八中学生都是家乡子弟，离乡背井，无依无靠，无论如何不能开除！”他的话得到广大师生的拥护，因此学校里也就不敢随便开除学生了。

他渴望民主，极端痛恨贪官污吏（日记中数处骂贪官污吏）。他一九四五年的自拟门联：“民主国家，大同世界”说出了他的理想和毕生的奋斗目标。一九四六年，他为合肥包公祠撰写楹联曰：

垂庙貌七百年，素怀天地无私，长留正气；

假公家三尺剑，除尽贪人败类，永奠邦基。^①

表明他的胸襟抱负和鲜明的政治态度。在永绥的几年，较大规模的纪念会、庆祝会，只要是他身体能够支持，总是尽可能去

^① 此楹联曾悬在合肥包公祠内，后被毁。

参加，并发表演说，用革命爱国思想教育群众。他随时关心民间疾苦，注意水旱灾害。抗战胜利复员时，目睹湖南桃源、常德一带水灾，他途中写信给湖南省国民党省党部和省议会，呼吁赈灾，提出赈灾方案，并樽节川资，捐助三万元作为倡导。他极力赞助教育事业，一生主持兴办过六个学校。抗战复员后，还亲自过问民生、崇实小学和静文中学的复校筹备工作。这些都是在他去世前数年内的事情，可以看出他思想上并不消极，并没有“出世”。而是限于环境条件，无法活动，不为人知而已。正如他诗中所说“登高心在力全衰”，这才真正是他的内心感触。当然，他不是共产主义者，思想和活动都受到一定局限，这也是我们不能求全责备的。

先父从二十多岁离家出来革命，数十年来未曾还乡，但对桑梓怀有极为深厚的感情，他满口浓厚的乡音始终未改。我因生长在北京和上海一带，只会说普通话，他很不满意。有一次他对我说：“你十几岁了，应该学学说官话了。”他所谓的“官话”，意即寿县家乡话，从此可看出他对家乡感情之深。平时只要安徽家乡有人来访，他都非常高兴，详细询问家乡情况和民间疾苦。如有所求，他都尽可能帮助解决。我考取了中央大学水利工程系时，他非常高兴。对我说：“淮河为害安徽，家乡人民深以为苦，我原想致力于治理淮河，曾写过一本《导淮意见书》，但蒋介石怕我出任治淮委员会后，手里掌握十几万民工，造成对他的威胁，不敢给予任命。现在，你学水利工程，将来可以治理淮河，完成我的夙愿。”并要我好好学习，以便为桑梓服务。他在诗文中经常流露出对家乡的眷念之情。抗战胜利后，他对我们说：“你们姐弟们都没有回过家乡，连家乡是什么样子都

不知道。现在抗战胜利了，我要带你们回去看看。”但不久他就去世了，这个心愿竟没有实现。现在，安徽要纪念他，说明家乡人民并没有忘记他，共产党没有忘记他，又给了他很大荣誉。我想，他也可以含笑长眠于九泉了！

（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：

《纪念柏文蔚先生》〈未刊本〉）

父亲支持我去延安

代序二

柏心锦^①

父亲去世已经三十九年。

一九四〇年，我离开湘西，跑到重庆，要到延安去，是在山城重庆和他老人家见最后一面的。

抗日战争期间，父亲和全家居住在湘西永绥（现花垣县）。我在国立八中女高部读书。当时的国立八中有十个分校，总校长是邵华。邵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，C. C 分子，高中女子分校校长也是他兼的。他推行的是国民党的“党化教育”，对学校进行严格的统治，迫害进步师生。为此，我们曾几次闹学潮，进行罢课斗争。我们的行动遭到学校当局的压制。一九三九年冬天，为反对学校当局强迫学生在腊月天换上单薄的军衣接待参观人员，又爆发了一次学潮。因为是我带的头，学校扬言要开除、逮捕我。我当时已经接受了进步思想，爱国热情很高，对国民党的统治非常不满。我知道父亲始终是反蒋的，父亲几

^① 作者是柏文蔚先生的三女，又名柏培思。